

今日評論

第 四 卷 第 七 期

這一週

國防建設的中心綱領

英國的歧途

甚麼是行政效率

舊詩與新詩的節奏問題（上）

美國的政爭與外交（紐約通訊）

吳之椿

吳學義

周世述

孫毓棠

瑤人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這一週

「八一三」戰役，在我是自衛成功的發軔。這是「八一三」三週年紀念。蔣委員長告淪陷區同胞文的一句話。這話有深切的意義。這次中日戰爭的發端，彷彿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其實不然。「七七」蘆溝橋事變，實際是日寇試探中國抗戰決心的事件。從「九一八」起，中國政府及人民都抱定寧辱負重決心，以求用和平方式解決中日問題。所謂「和平不到絕望時期，不放棄和平」。惟其如此，日寇就寸進尺，愈逼愈緊。日寇認我國的「忍辱」為永遠的屈辱。認我國永無抗戰決心與勇氣。「七七」蘆溝橋事變，在日寇看來，以為是熱河事變，冀東事變的重演，日寇的侵略又可推進一步。事實亦的確如此，倘蘆溝橋事變，不演成日寇的侵佔平津，則中國抗戰或相當拖延亦實可能。平津失陷以後，在中國的確已到了最後關頭。中國對倭抗戰於焉決定。「八一三」上海戰事因以發動。後世史家的確應以「八一三」為中日抗日抗戰的發軔日。「八一三」這日期，在中國民族復興史上，的確比「九一八」及「七七」更重要。「八一三」這日期是中國國恥的結束，是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發軔！

英國已決定撤退平津滬各地駐軍。英國撤軍的用意何如，我們不得而知。依我們的推測，英方用意，不外下列三者之一：（一）對日作進一步的阻擊，以求和緩日寇反英；（二）英國目前對德意作戰，須抽調此間軍隊，以增強他處防衛；（三）英國為強硬對倭的萬一準備，故不願倭軍深陷重圍。英方用意，三者之中，究屬那一項，各方都在揣測中，都無從推斷。惟目前有一點我們可以深信，則英國撤軍一層，絕不足以影響遠東大局，更不足以影響中國抗戰前途。事到今日，真正決定遠東命運者，乃中日戰爭的勝負。在決定中日戰爭勝負上，英法力量，今日已可置諸問題之外。故英國駐軍撤退與否，直可認與遠東局無關。英國撤軍，在英國姑無論其用意何在，中國可不加以重視。同時，英國撤軍，亦未必即是日寇得平津滬權益的證實。區區少數英國駐軍，在英國方面亦不過租借地裝飾品而已。日寇對英之顧慮，當然亦不在此少數駐軍。故今後英國在平津滬權益之如何轉變，還視英

國遠東政策為轉移！還視歐美各國之遠東政策為轉移！

行政院於本月十三日舉行四七七次會議，決定防止走私並取締囤積居奇。是善政也。這在當前國計民生上，的確是重要設施。話又說回頭來。政府防止走私與取締囤積的決議與法令，這固不是第一次。但走私者自走私，囤積者自囤積。豈止如此。惡風且與日俱增，與時俱漲。原因亦實簡單。中國今日最大罪惡，即在官商不分，做官與發財，合為一事。在今日中國，商人做官，固不妨害其商業；官人經商，亦不妨害其官運，兩事且相輔而行，相得益彰，因以造成官商合一的局面。實則不必備舉，亦不便列舉，更舉不勝舉。走私與囤積，需要兩個條件：（一）資本；（二）勢力。官商合一，則兩條件同時具備。彼既有勢力有資本而官商合一之人物，彼即可取得超越法令禁令以上之地位。因此，走私自走私，囤積自囤積。此今日之真象也。故今日防止走私，取締囤積的唯一有效方案，還只有整肅官紀，澄清吏治的辦法。此事且須從嚴懲大官着手。政府倘真能將舉國注目的走私囤積之巨奸大惡，嚴懲一二，風氣必大有轉移。最高從政當局，其有意願了！

國民黨中央黨部增設婦女部，這是七中全會的決議案。婦女部部長人選，目前又成為全國注目的事情。婦女部雖是黨部中的機構，國民黨既佔在中國領導地位，則婦女部當然亦是全國二萬萬以上婦女的領導機構，而婦女部部長，即為二萬萬以上婦女的領導人物，絕無問題。婦女部部長人選重要，於此可見。依我們的見解，婦女部部長人選，必具備這幾種條件：（一）在社會事業上或婦女運動上成績可考；（二）對中國婦女各種革新事項，真能躬行實踐；（三）有崇高的人格與現代的知識，而為國中婦女一致所敬佩。我們憑什麼提出這些條件來？老實說，中國今日仍未脫「妻以夫貴」的社會。中國目前婦女們一有舉動，若慈善救濟及其他社會事業，其出名領袖人物，盡是大有貴人的太太夫人。所謂太太夫人者，不但對所領導之事件無了解，無興趣，甚至其行動與所提倡者相矛盾。其本人可以口紅指背，其演講却

可新生活節約的。此種矛盾，使中國婦女運動成爲滑稽戲。影響婦運前途，實非淺鮮。必打「一妻以夫貴」的傳統觀念，而後中國婦運始有前途。而後中國婦女纔有獨立自尊的人格。目前社會婦女們正在紛紛討論婦女部部長人選問題，請以此項意見貢獻。國中婦女們共以爲然歟！

「八一四」是中國的空軍紀念節。這是紀念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我空軍在杭州笕橋擊落日寇空軍的勝利。這個紀念節的重要，在追念過去，更在振奮將來。三年抗戰，我國空軍對國家的功績甚大，這是事實。我國空軍發達較日寇空軍更晚。戰事發動時，我空軍數量亦遠不及日寇。我空軍畢竟以寡勝衆，以少勝多，我空軍這種光榮成績，令國人忻慰，令國人敬佩。這是八一四值得紀念之點。這正是追念過去而已。人類歷史，每一新武器發現，則社會局面必生一次變動。國際間誰擅長此項新武器者，誰即可以取得優勝。保持生存。空軍之應用，使現代國際戰爭，與以往一切戰爭改觀。在最近將來之相當時期中，某一國有精純的空軍，某一國即站在優勝強盛的地位。這是我們在空軍紀念節應警惕奮發之點。我國空軍在三年抗戰中，既有如此光榮偉大成績，從此再努力求進，則前途當無限景。願國人與空軍將士共勉焉！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團結，最近有新的進展，這真是全國國民極可忻慰的消息。抗戰三年來，中國整個民族，已經團結一致，那是事實。黨派間偶然有細小不幸事件發生，有細小磨擦，亦係事實。這種事實，亦不必隱諱。據深悉政治內幕者傳言，最近此一細小磨擦，已有了各方滿意的解決。其實在此困難中，國人無論在台與在野，只要抱定「公忠體國」四字，即可將一切個人間及團體間之磨擦，無形泯滅。民主國家的政黨，主要作用，在奪取政權。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家不存，政權何有？看到此點，則今日中國各黨各派間無不可解決的問題。國共兩黨團結上有新的進展，這證明雙方都能「公忠體國」。國、對黨黨領導人物，同深敬佩。精神團結增進一步，即抗戰勝利接近一步。這的確是國家大可忻慰的消息！

最近政府規定以發展驛運爲今後黨政中心工作之一。爲着對敵人的封鎖政策，爲着解決我們汽油的困難，驛運制度的確是一種良好的辦法。但在實行的時候，應該特別注意防止各種可能的弊病。現在所定的驛運制度，是一種強迫服役的制度。根據已往的經驗，因爲保甲制度的不健全，徵工常常會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現在政府已經有防止這些不公平的辦法沒有？又已往對服役的人所給的報酬，往往不能到服役者手上，而爲地方官吏所中飽，現在政府有補救的辦法沒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盼望政府能有整個的計劃。至於一般的民衆，則應各盡所能，使驛運制度能够順利推進。因爲驛運制度的成功，就可以減少敵人對我經濟封鎖的力量，增加我國抗戰的力量，所以每個人都應盡力的責任。

財政部在本月七日所公佈的「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最近各報已經刊載全文。該辦法最重要的規定，是限制銀行直接囤積貨物或間接借給商人去做囤積居奇的活動。違反規定時得「處以所營業務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下之罰款」。我們認爲財政部這種規定是適當的而且必要的。抗戰以來，不少的銀行用囤積貨物和外匯投機的方法來獲得巨額利潤，這已是人所盡知的事實。在這國家民族正作生死存亡的鬥爭的時期，我們的銀行界中竟有大發「國難財」者，這不獨是中國銀行界的恥辱，也是中華民族的污點。現在政府對囤積貨物已加以干涉，但能否再進一步去禁止外匯的投機？當然，政府如要禁止銀行界去做囤積貨物和外匯投機等業務，則政府人員便應先行以身作則。這點我們又能否辦到呢？

自漢越源兩路交通停止軍用品運輸後，汽油價格，突飛猛漲，但各都市若昆明，重慶，成都等地之公私汽車，依然叢集道途。國家對此項輸入汽油，存儲多少，事關軍事秘密，我們不願過問。但無論如何，今後輸入逐漸減少，乃不可避免的事實。此種軍事上必需資源，時至今日，國民凡有愛國心者，即應努力節省，以濟國用。私人任意消耗汽油，此在今日，不止過分奢侈，且係減少抗戰力量。當局應急謀有效方法加以取締與懲治。願當局不以事件過小，加以忽視爲幸！

國防建設的中心綱領

吳之椿

一國的人力 資源在任何時期內不是無限的。近代的國家在這兩方面增加很快，但在某一時期之內，人口與財富的總額只有那些，不會超出那個限度。中國是一窮國，財富遠不及許多的工業國家；就大體而言，工業沒有成立，天然資源已探明與開發的居極少數。這個基本事實當然會給中國將來的建設以重大的影響。中國之不能舉行全盤的建設，不應該提出百廢俱舉的口號，就是受了這個基本事實的限制。一個國家要想以有限的人力與資源做無限的建設，是不量力與違反常識。昔賢說齊家治國有一貫的道理，如果家政僅是百年大計，而忽略明日之柴米，僅是百廢俱舉而不辨輕重緩急，這家政必是漫無歸的與系統，未有能持久的。然而一談到國政，人們偏偏忽略這個常識。家政與國政在建設方面，應無歧異之處，而必欲較異之，毋乃可怪。中國今日之建設，言其緩急莫急於國防，言其輕重亦莫重於國防；吾人應該確實估清自己的力量，集中用之於國防的建設，然後纔有任何效果可言。

一國在一個時代的工作儘管有多端，但其中必有一件是其中心工作，在其關係上綜括全局的樞紐。這件中心工作認清了，全局皆醒；這件中心工作做到了，全局皆生；這件中心工作失敗了，全局皆非。執政的人抓住這個樞紐，政治纔能着手；民衆了解這個樞紐，纔有政治可言。在各國的歷史中可以提出許多的例子；最顯著的例子無過於德國的近代史。在十九世紀中德國的人民曾想到兩件工作，一是政治的自由，二是民族的統一。大體言之，第一件工作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失敗了；第二件工作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完成了。耶拿（Jena）之戰的時代，是兩件工作思想上的分野；在那拿前後謝世的思想家，是屬於主張建設政治自由的人；他們的眼光世界的，目標是理想的。直到一八四八年憲政運動失敗，政治自由的運動也就算是結束。在那拿以後得勢的思想家是屬於主張民族統一的人，他們的眼光比較狹窄的，國

家的，目標是現實的。他們的理想可以概括在特萊西克（Treitschke）一句話裏面，「一切真正的偉大，無不以民族爲其基礎」。自此以後政治自由的運動逐漸被民族統一的運動取其地位而代之；德國的改造因爲放棄了遙遠飄渺的理想，握住現實，縮短時間，縮近日程，步踏入成功的境地。及到俾士麥（Bismarck）世界最大的現實主義者之登台，以超軀之手腕，於十年之間（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二）將德國的民族統一的大業（Großmacht）呵成。這段歷史，可謂充分證明時間性在建設事業上的絕對重要。最近的歷史如列寧之於蘇聯，凱末爾之於土耳其，皆是如此。中國今後政治建設的中心樞紐就是國防建設；國防建設如想成功，其完成所需之時間不能太長。

國家建設之成功者類皆及時而成，及身而成；如果標的複雜，時期遙遠，數易其人，必致困難叢生，久而無功。此中原因，實極明顯。特每不爲人所注意。大抵各時代有其當時人物與環境的因素；這些因素甚少固定而常在變動，或劇烈變動之中。人物有新舊，政治有泰否，外交有順逆，經濟有進退；此種因素可能之變遷，二三十年有如隔世，試以一八一八至一九四〇相比，尤爲顯然。國家之建設必憑藉此種種因素，而幾乎不能於此外另有憑藉。一經條件問題之中心樞紐，必須迅赴事功，趕速完成。其完成所需之時間愈短，則所受時代變遷之影響愈少，而其成功之希望亦愈大。此種經驗，外交上之變化及其影響，最易證明。加富爾（Cavour）義大利的統一，其外交政策之成敗繫乎法國之意向，尤繫乎法皇拿破侖三世之一人；故法皇進兵而義大利中心北部之統一告成，法皇停兵議和而其未竟之統一事業遂一時停頓。一國之政策如有所賴於鄰邦政府之同情與援助者，則每當鄰邦發生重大變動亦不得不受重大影響。如欲避免此種牽連，只有趕速完成自國之事業。加富爾本身之功業告成於十年，義大利全部統一事業告成於二十年；吾人研究歷史對於

此種特性的影響，似亦足以應得之注意。足以影響事業成敗的變遷，在外交方面最容易看出，但自然不限於外交方面。其他方面的如經濟，教育，科學知識與技術等等，在現代的情況之下，經過時間越久，變動越大；所以一件事業的完成期限越久，所受外界變動的牽連的危險也越大，成功的希望也越小。國家的建設就是同一個道理；在相當限度之內我們可以說，國家建設之成敗是與其速度及期限成反比例的。

我們試持此觀點而論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建設，可以得到一些切身的教訓。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建設，無論在內政，外交，教育，交通各方面，極端困難，挫折，顛沛流離之致，走上了循環式的迷途；每經一次挫折，困難較前增加。此中原因固不一端，但亦可盡歸罪於時代不好，機會不來。事實上，數時代不好的，多半由於自己辜負了時代；數機會不來的，多半由於自己錯過了機會。循環挫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主持建設的人未曾把握住時間性對於建設成功的絕對重要，不能於相當短期之內將事業猛力推進，一氣呵成，以致演成後來的時移勢遷而竭三衰，終歸失敗的結果。他們每定一次計劃，完成的期限少則十年，多則二十年或更久；執起來又復因循拖延，枝節橫生，從無以傾大之魄力謀事業之如期完成。至今日中國在各方面尚有若干之成就，不能不歸功於苦節之士，堅強努力。但以整個民族之工作，三十年後僅有如許之成就，其辦事功之不相稱，勞力與結果之懸殊。吾人固應有不畏挫折的精神，吾人尤應提防事業因環境變遷而流產，與由積習相沿而養成之凡百事業的流產性；而縮短完成的時間是一個必要的方法。中國的建設事業凡是以十年或二十年為期的，無一成功；及至後來將同一事業的時間縮短為三五年，反而成功。以言內政，一九〇六年清廷立憲的主張期以十年或十年以後實現；結果憲政未立，清廷已亡。以言教育，中國之普及義務教育計劃，至少先後兩次以二十年為期清文官普及教育之期，結果毫無任何實效；其後又將二十年縮短為十年，但行之未及三年遭逢抗戰軍事影響，遂發生停頓挫折之現象。近來有數省區秉承中央所指示之方針，認清普及義務

教育確為抗戰建國所必不可缺之基礎，先後擬具實施計劃；大體上其時期遠較以前者為短，故其成功之望亦應遠較以往者為大。如四川省所擬之計劃，原以五年為期，但經中央縮短為三年；吾人認爲此種修正最為扼要，給予四川省普及義務教育之成功以甚大之保障。其他之事例不勝枚舉，如粵漢鐵路，如禁烟，等等，皆援據數十年未能成功，但一經將限期縮短，則一切皆能如期完成；粵漢路卒於抗戰以前以最短時期全線暢通，禁烟則於六年之內依限完成，一向似乎普遍流行著一種錯覺，就是中國是一個老國與窮國，所以別國的建設可以快，中國的建設只有慢慢的進行纔有辦法，纔免得牽動古舊的棟樑以致房屋倒塌得破壞老社會的安寧秩序。這種錯覺是一個心理上的絕大的錯誤，無形中構成了「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一類的低能心理。這種錯覺，一部份由於人類共同的情性，一部份由於一種錯誤的假定，以為地同此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須持以有恒，假以時日，事必有成。然而時代一變，人物一變，問題一變，興趣一變，縱能勉強勉勵支持，其事業或已失去本來之面目與精神，如禁烟之變為變相的賣烟，皆是。近五六年以來種種的事實，證明中國，在已經着手的幾件事業上，不但能够建設得與別國一樣的好，並且也能與別國一樣得快；自擬的風氣漸漸改爲自信，並且這種自信日益擴大與堅強。樹立這種自信的一個絕大助力，就是近幾年來建設事業，完成的期限一體是短，所以終能如期完成。根據中國的環境，針對中國的需要，憑藉中國自己的建設經驗，再回想過去建設上循環挫折的歷史，我們覺得尤其是在中國，任何建設無論大小，如要保障能够成功；必須將完成的期限縮短，大致三五年應該是相當充裕的時間了。如果進而觀察國家的處境的艱危，與世界形勢的險惡，我們所求的是喘息的機會，所爭的是一瞬的時間，深信中國已無安詳闊步的餘地，而必須於最短的時期以內完成國防的建設。

中國今後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建設獨立雄厚的國防，一是取得外交上的均勢以代替國防，別無第三條路可走。第二條路中國走過了，結果除

敢，別國也走過了，如比利時，捷克，結果也慘敗；所以中國現在只剩下一條可走的路，就是將國防趕快建設起來。國防一向有廣狹二義；整軍經武是狹義的國防；廣義的國防就很難明定界限，可以說無一件遠近平凡之事不與之有一些關係。中國今日僅是整軍經武必然不够，狹義的國防只是國防之一部；廣義的國防又嫌內容太泛，標的散漫，也不適用。中國今日所需的國防是介乎廣狹二義之間，應該包括政治，軍事，外交，農業，工業，金融，交通，教育，衛生各部門的事業在內；其一貫的精神在於創造，整理，指導全國的人力物資於一定期限之內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因此，其範圍雖相對的廣，其目的必須絕對的專。教育必須是國防的教育，外交必須是國防的外交，經濟必須是國防的經濟，整個的政府亦必須是國防的政府。全國的人民也必須藉着有計劃的宣傳，將國防的精神普遍貫輸，使他們的生活與活動與國防建設相配合。完成這一件偉大的事業所應具備的條件千頭萬緒，非片言所得而盡，但我擬於此種種條件之中提出一件來討論，就是國防建設應有中心綱領。

中心綱領的最大作用是在訂定標準以支配全部的國防建設。此種標準之舉例，如某種事業之當興辦，或停止，各部門事業之比較緩急，興辦之次第先後，經費支配之多寡，完成限期之遲早，皆須依據所訂定的標準纔能決定，此其一。中心綱領應注意各部門事業之聯繫，如工業與農業，學校與工廠，各部門盡其在全部建設中所應盡之機能。其全部建設亦因各部門有此密切聯繫而成爲有系統的個體；其全部建設的目標亦藉此中心綱領而明確無訛的顯出而專一，此目標即是國防，此其二。中心綱領可以防止人力與財力的濫費。濫費之道不止一端，虛擲公款項人力，固爲濫費，其弊易見而防止亦易。明爲有益之事業，但因與目標無關或甚少關係，以致急需之公家財力移用於雖有益而不急需之事，此種濫費數甚大而防止亦不易。惟有訂定中心綱領之後，纔能樹立一種緩急的標準，使不急需之事業緩辦或停止。因爲有中心綱領所訂定的標準，所以中央與地方當局或私人團體每當

興辦一種事業，就很容易的決定其應否興辦。因此，中心綱領應該履行規定在此綱領有效期間，綱領以外的一切事業概不得舉辦，以收集中公財人力財力之效而免濫費。此其三。以上三端爲中心綱領之重要作用；中國之國防建設一經詳密規劃，訂定中心綱領，再進而嚴格施行，依限完成，則所獲之結果，不但是各部門事業之個別成績，並且於此個別成績之外，之上，實現一整個的意義與目標，就是國防與民族的生存。

中國興辦建設事業爲時不可謂不久，但有一大毛病，即有建設事業而無支配建設事業之中心綱領，且亦從未以國防爲綱領之計劃。甲午以後辛亥以前之建設，極爲凌亂浮泛，東建一局，西設一廠；甚或設廠前後之需要亦不復計及，充分表現初期的幼稚病。但其對於倡導與宣傳，要亦有甚大之功用。辛亥以後國人對於建設，眼光放寬，認識加深，感覺應從根本入手，力戒浮泛而忌近功，此可於此時期教育事業之發展見之，爲中國建設在思想上之一大進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因政府之倡導與國民之熱心，一時建設事業各方並進，然其弊病在於標的散漫，無支配運設之中心綱領，亦無整個建設計劃。一時風尚所趨，凡屬建設皆爲可取，建設本身成爲目的，民衆只知爲建設而建設，亦從未計及民族生存攸關的國防。除七七事變前數年政府幾種措施以外，公私建設未嘗以假想應付敵人而有所行動；以視他國在備戰期間將公私經濟齊持以赴公同之目的者，相去有天壤之別。中國近數年來公私經濟用於此種種建設者，無數萬萬，今日幾全部淪陷，等於虛擲。如果當日移此數或其一大部份於國防，則今日中國之國防實力必大有增加。惟以中國之建設，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故其結果，有建設而危國家，有事業而無目的。中國今後之國防建設，如欲免除此種弊病，應該從訂定嚴密的中心綱領着手。

余草此文既竣，得知七中全會議決「設置中央設計局，主持全國政治經濟建設之設計及審核；另設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主持黨政機關工作，經費人事之考核，與中央設計局確切聯繫，以矯正設計，執行，考核分立之事

端。而樹立行政三聯制之基礎。中央設計局之職權與組織現尙未見明文規定，但對於此機關之重要性可爲初步之估計。中央設計局之設置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倡例之一事；近年來中國政治的措施沒有一件比這次決議更重要的。我們揣測這個機關的設置應該對於設計全部國防建設計劃有重大的裨益。爲達到這個目的，這個機關應該不僅是一個任職的專家諮詢與設計機關，受政府的委託去設計某種事業；而是對於整個的國防建設居於領導的地位，有大權去領導、設計、整理、支配全國的建設事業。必須權力大然後責任纔重，然後纔能產生富有創造性的計劃，與羅致能够產生這種計劃的人物。中央現在

英國的歧途

吳學義

十年來的英國外交政策，是犧牲他人，保全自己；結果是他人被犧牲了，自己亦未得保全。九一八至一二八，如英外相西門不積極給日寇張目，拆東打生的台，則彼時日寇尙知顧慮國聯投票五十三對一的世界輿論，英美列強在遠東的勢力，決不敢肆無忌憚，放胆侵略。奈近視眼西門的幻想，被日寇的宣傳所欺，以爲日寇只志在得東北四省，與英國的利害關係很輕，且日寇蓄意侵略東北數十年，不如犧牲中國的東北四省，以圖一時的苟安。故不但拒絕史汀生英美合作制日的請求，並在國聯大會發表祖日的言論，在報紙宣布不與美國合作的態度，助長日寇侵略的氣焰與決心，致史汀生主持正義公理的滿腔熱血，付諸東流，法國故外交家白里安維持國聯威信的理想，成爲泡影。其結果：日本軍閥奪得政權，代表文治派的政黨內閣垮台，幣原外相隱退，不談外交，以求保全性命於亂世，計劃在十年的黑暗時期內，主編明治維新以後的外交史，捐得經費數十萬，僱用助手數十人，已出版數卷；國聯威信喪失，世界和平秩序，由一隅破壞而牽動全身，野心圖霸起效尤使略，是造成今日世界大混亂的局面。

因爲九一八與英美的近視自私政策，造成今日的世界大混亂，而其犧牲則

已經有最高國防委員會，爲主持國防的最高機關。中央設計局的權力應該僅次於最高國防委員會，而同時應該在最高國防委員會內有發言權可以影響國防政策。其對於最高國防委員會的關係，不應爲普通下級對於上級機關之關係，而是如議會中之重要委員會對於議會之關係。議會中之財政或外交委員會，在職權上受議會的指揮，但事實上可以左右或決定議會的財政或外交的大政方針。因此中央設計局的人選必須有一部份由最高國防委員會的負責人參加，纔能發揮其最大的效力。中央設計局必須是一個有生氣、魄力的機關，然後纔能領導偉大的改革與國防建設。

人保全自己的作風，亦到現在尙未變更。虎頭蛇尾，有始無終。稍遠，如何比西尼亞抗議，西班牙內戰，到前年犧牲捷克之慕尼黑協定，而登峯造極！因希特勒「最後的領土要求」之諾言無信用，張伯倫才不敢犧牲波蘭而締結第二慕尼黑協定。不過爲首先承認「滿洲國」的波蘭而發動「爭」，有點不技巧，而且號稱歐洲強國的波蘭，只抵抗了一天而滅亡，與抗戰一千多天尙屹然不動的中國相比，亦未免太脆弱了。近如丹麥威爾荷比之被犧牲，遂使土耳其羅馬尼亞回復中立，與國盡失，竟成孤立。號稱援華，在西門財相時代，要求對華信用貸款三百萬鎊（不及戰時英國軍費一日所需六百五十萬鎊之半數），磋商半年方勉強成功。前年日寇占領廣州，海南島，均不過試探性質，如英法態度稍強硬，即足以過問之。奈坐視不理，致中國失却最佳之進出口路線，預伏今日侵略香港安南的禍根。而最無理最令人痛憤者，則爲去年七月與今年七月兩次的英日協定，均由克萊琪與有田八郎在東京締結，做照慕尼黑協定的作風。但因中國堅強抗戰到底，不能發生東方慕尼黑的結果。不過增加中國的困難與決心，助長日寇侵略的氣焰與便利。

去年七月的東京英日初步協定談判，本來其範圍包含法幣，天津存銀，

香港路綫等問題，據日大使克萊琪與有田八郎通電表露。不料調查表英日東京「初步協定」之次日，突被美國以閃電式的外交戰，宣告美日商約滿期後應歸失效。幸賴從旁殺出一員大將，把英日東京談判打斷了。然借此「初步協定」的影響，即使中國法幣黑市市場由八便士暴漲到三便士，現猶徘徊於四便士之間。因之上海物價指數，去年八月比七月暴漲五十幾點，後方各省物價隨而提高，令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生活直接感受痛苦，這都是張伯倫妥協外交之所賜。去年七月，歐戰尚未發生，英國何以對日如此遷就？這除了近視自私之外，尚有其他原因。英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領，與共產主義的蘇聯冰炭不相容。當時英法蘇談判半年，英國無誠意，只派中歐司長赴蘇，以蘇聯要求條件太高，無成功希望。他方德國對波瀾問題加緊逼迫，英國思及共誓日盟友，欲讓蘇聯，以安定遠東，俾得專心對德。幸而這種幻夢，被眼明手快的美國破壞，胡大使在美國努力，誠堪欽佩。而有田八郎即因此微功，擢在米內內閣重任外相。在一年之後的今日，有田八郎又於七月十八日與克萊琪締結了第二次英日協定，方隨米內內閣下台，留下一件去思，英國把中國做禮物。有田與克萊琪，固屬老搭檔，而哈立法克斯之連任外相，亦是覆邱吉爾的聰明。外交政策的運用，仍與人的關係有相當影響。

此次的英日協定，據邱吉爾在英國會的報告，謂：「……本政府亦須顧及目前之國際形勢，不能忽視一種主要之事實，即吾國正在作存亡繼絕之苦鬥是也。」似此次之犧牲他人，保全自己，具有不得已之苦衷？即一為消解目前緊張空氣，以緩和日寇封鎖，攻擊香港，間接安定新加坡印度，維持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故英日協定簽字後，代理新加坡總督理恩即大廣播英國將調停中日戰爭，其保全自己的心理，表白無遺。二為看其日寇不放棄不介入政策，以免其加入德意陣心，攻擊英國。

實則英國的胆小與過慮，凡稍明日本情形者，均知其又上了日寇虛聲恫嚇的當，重蹈九一八以後的覆轍。中國英勇抗戰三年多，日寇深陷入中國的泥沼，無論就人力財力物力降海空軍言，均無餘力同時向第二個強國作戰。

故張敬堯臨門坎事件，好大喜功的少壯軍人，雖躍躍欲試，終於對蘇屈服已充分暴露其弱點。今英國雖於歐洲正在作存亡繼絕之苦鬥，然香港防禦工作，自民國二十四年以來即加緊充實，日寇非可與德國相比，不能於二三個月內攻破。且戰爭一起，日寇在世界的海上商船交通，將被英國的大海軍及全球殖民地所斷絕，經濟貿易又被英國封鎖，損失之大，使日寇不敢輕舉妄動。至於正式一介入一德意作戰，更屬心有餘而力不足。去秋日寇之聲明不介入歐戰，即係自虛無此力量。日寇之鐵嘴豆腐腳，自張敬堯事件不敢聽德國使向蘇聯進攻，即被德國看透其無實力，不資格做打獵狗，故轉與蘇聯成立協定，拋棄日寇於軸心之外。今日寇如欲回復防共協定，加入軸心，不但與德蘇協定衝突，且德國亦不欲不中用的日寇加入分贖，故對於承認偽汪政權，已表示不感興趣。日本軍閥雖欲乘歐戰千載一時的機會，乘火打劫，奪取英法荷在亞洲的殖民地。然若不披其虛聲恫嚇所壓倒，準備應戰，日寇必不敢訴諸武力。此觀於四月十五日日外相有田對荷屬東印度聲明，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給他一個針鋒相對的聲明，即銷毀偽幣，到底不敢動手，發觀其假辦子的試探態度。而英帝國竟屢次被其試探恫嚇成功，真大胆小與老大了。

須知日寇島國人的劣根性，是欺軟怕硬，慾壑難填。如予打擊者以打擊，若二十年前第一次歐戰時，日寇出兵西比利亞，想乘火打劫，被俄國予以實力的教訓，二十年來不敢向蘇聯覬覦。反之，若一味遷就退讓，則姑息養奸，適足養其侵略的氣焰，得寸進尺，不知止境。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英國以為犧牲東北，可保全華北華中越南的權益，鑄成今日的大錯。前年日寇侵略海南島，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以後果積糧南進，着着進攻。若再錯一步，則將滿登皆輪。不但香港新加坡南洋羣島不保，即對印度泰國亦早已種下侵略的種子，以包圍緬甸，席捲菲律賓，進攻夏威夷，唯美國尤其史汀生深知日寇的野心，故始終以太平洋的監督人自任，妨阻日寇的南進。四月間的荷印問題，既加以嚴厲阻止；此次英日關於緬甸禁運的協定，赫爾國務卿

亦直斥英國的不正當，並將英對日禁運禁輸，以作實際的抗議。同時批准兩洋艦隊大海軍制，一九四六年完成軍艦七百艘，充實實力外交的後盾，以作他日總清算的準備。羅斯福的徹底解決，高瞻遠矚，比較英國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近視自私，結果並不自利的外交，高明得多。

爲英國目前及將來的利害打算，如欲維持遠東權益及穩定，防止日寇介入歐戰，唯有援華抗日，使其無力與第二作戰。這點蘇聯認識最清，故同情中國抗戰到底，消滅軍制日寇的實力，以除東亞之憂。德國亦因看透日寇對華戰爭消耗實力，甚，無力同時攻蘇或攻他國，故去年摒棄其於核心之外。美國亦知日寇深陷泥沼，無力作怪，故始終對倭取高壓監視的態度，去年格魯大使在東京美日協會大訓訓日本要人，日寇仍真可奈何。獨在遠東權益最大屬地最多的英國，每次接受日寇的惻隱威脅，遇事遷就妥協，以爲喂狼餵一塊肉，可以苟安且夕，不知更引起其喧嘩狂吠。邱吉爾一希望在三個月之內可以覓致一種公允之解決辦法，使雙方均可接受，……準備對中日兩國竭盡棉薄，真是南轅北轍，白費做夢。歐戰失敗後的英國，對日已失却調停的力量，何況日寇三年來花費鉅量的人力財力物力，滿以爲爲山九仞，要想一舉而征服中國。決非英國式的「和平及和解步驟」所可一求其成功，若欲藉緬甸路綫（香港已禁止華茶出口運蘇）乃至將來日寇必繼續提出的法幣問題，禁止南洋華僑愛國捐輸問題，壓迫中國屈服，更屬不可能之事。彼時日寇要求無厭，英國窮於應付，仍有破險衝突之一日。如此時少削弱中國一分力量，即增加一分牽制日寇的力量。否則如萬一不幸中國竟一旦屈服，則日寇不但拔出泥沼，且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積極南進，介入歐戰，除留一部分陸空軍防蘇聯外，其大部分海空軍可開往歐洲作戰，或在太平洋牽制美國，美國於大選後，猶更積極援英，德意自歡迎有實力的日本加入軸心。故英國以爲犧牲中國，保全自己，適足自食極端相反的結果。近視自私的外交，其本身必遭無窮的禍害。——中了日寇先結束對華戰爭，以便乘機介入歐戰的毒計。

英國外交政策的錯誤，種因於西門，張伯倫。哈里法克斯，克萊琪，爲繼承張伯倫外交政策的餘孽，到了邱吉爾內閣已積重難返。邱吉爾在國會對工黨議員諾爾巴克的答辯：「過去數年中余對此問題之看法，爲公衆所詳知，一，表示行不由衷；對前陸相倍立厘的答辯，直承認「此間局勢之變化，因之以影響我國在遠東之地位」。理智與事實相衝突，乃作「臨時性質」的協定，停止緬路交通期限爲三個月。希望在此三個月內，足以表現抵抗德國攻擊之能力。十一月美國大興揚揚後，如羅斯福總統確定連任，當可採取積極行動，屆時對日重開談判時，其地位可以較前優越。此爲華英聯合來社電從好的方面所爲善意的推測。實則日寇得寸進尺，吞下去了的東西，決不肯輕易吐出。誠如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云：「凡屬稍瞭解東方情形者，俱知將來期滿以後，日本決不允其恢復現狀。反之，日本既知英國必致屈服無疑，勢必更進一步有所要求。」故對英國方面，切不可作過分的希望，自動更正其錯誤。進一步之解決，尚須視遠東及歐洲前途未來之發展以爲斷。即中國應付此項封鎖企圖之最利武器，爲自給自足，繼續抗戰，以表現自己之力量。同時注重對美蘇的外交，利用美蘇的力量，以壓迫英國，阻止其對日屈服。例如去年七月的英日東京初步協定，即被美國破壞無餘，此次赫爾國務卿已正式申明反對此種不正當之英日協定，希望阻止英國屈服於日本之要求。並稱美國向來反對封閉任何地方之國際通商路綫，英國向日本之要求，封閉緬路路綫，係構成干涉世界貿易之不當行爲。美國夙講究法理的根據，英日此舉，顯違反九國公約國聯盟約及決議案暨英國之迭次申明。十一月大選揭曉後，如歐戰情勢不大惡化，美國當採積極行動。現已將艦隊留駐夏威夷，及考慮實施對日禁運。英日本願及此點，故禁運範圍，表面上限於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及鐵路材料，不及於普通客貨運輸，即爲敷衍美國的指責。抗戰三年，經過了不少的難關。而友邦給予中國的打擊，以去年七月與今年七月的兩次英日協定爲最甚。去年幸被美國攔腰截止，今年的風波，亦希望能安全渡過。日寇對華的進攻方式，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均已用

過而均歸失敗。此次近衛與國上合，懷抱了很大的野心與期待，急需於結束對華戰爭，方有力介入歐戰。預料外交進攻更將加緊，最後則仍着重向昆明西安的軍事進攻。必待一切進攻方式與力量均已用盡而不奏效，又遇着內外的壓迫，日寇才肯掉頭。此時而談和議，調停，三個月期限，均屬不明敵情，自救欺人。

抗。愈持久，愈接近勝利，困難的程度亦越增加。此次敵人的封鎖政策，來勢很兇，敵人亦很得意，如被我方突破之後，並以持久戰磁鐵戰對付敵

甚麼是行政效率

「行政效率」一詞，見於富國要人的演講，見於大學教授的文章，也見於新聞記者的社論，其習用流行的程度不可不謂廣大。如此習用流行之所以然，不外國人趨向的轉移，以及戰時事實的需要。大抵近年以來，國人漸覺政治改革之空談無益，不若行政建設之實際有效；於是轉移方向，不僅是爲了換換厭膩的空氣，也就是想藉以開闢幾個「用武之地」。可是抗戰以後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軍事勝利，固屬第一，行政進展，却須配合；迫於事實的需要，人力不能不充分地利用，物資不能不積極地保存。無論爲國人注意之轉移，或是戰時需要之迫促，其結果必然重視行政效率之講求與行政效率之增進。

然而，怎樣講求行政效率，怎樣增進行政效率，儘管在高談闊論着，我們不能不感覺詫異的就是：對於這個基本問題——「甚麼是行政效率」——却很少予以嚴重的注意，更似乎無人加以適當的分析。是不是爲了抗戰期內只重實際就可輕視理論了呢？抑或由於人性所趨只顧表面而即忽略了根本呢？關於甚麼是行政效率這個問題，普通所見的總不出兩種解答：卽一是「經濟說」，另一是「物質效果說」。兩者的理論，似乎都不甚正確，或竟可說完全錯誤，我們願先分別加以論述，然後建議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說法。

爲便於討論起見，我們在此先提出後一種理論。主張「物質效果說」的

人的軍事進攻，則黔驢之技已窮。對華戰爭一日不結束，日寇即無力介入歐戰。卽失敗於東方，復因之不能混水摸魚於西方，日寇焦燥苦悶，近衛荷花大少松崗流氓，必氣得暴跳，如二十七年之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半年一載之後，如國際情形轉變，敵國內部亦無法統制，方能談到平等光榮的和平。在目前之抗戰階段，正如爲山九仞，唯有繼續努力，堅忍持久，爭取時間，以達最後勝利的目的。

周世述

，以爲行政效率的唯一目標在求最大的物質效果，或是以最小的物質犧牲來換取最大的物質效果。從他們看出，行政效率是物質的，而不是精神的；是機械的，而不是觀念的。他們覺得整個的政府組織，不過是一座平常機器；所有的行政人員，也莫非這座機器的各種零件而已。他們心目中，一座政府機器的效率，就以這機器直接產生底有形的，物質的效果來決定；反之，如果所產生底有形的，物質的效果十分稀少，也就可推論這政府機器的效率是根本微弱的。

「物質效果說」顯然是政治學裏面的國家有機體論，和近代工商管理中的實業效率說交合而出的產物。我們對於這種理論認爲至少有兩個缺陷：首先，政府組織之比作一座機器，在研究方法上說雖無不可，但這根本否認了所謂人是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卽使政府是一座機器，也決不像電氣馬達，或是紡織機器那樣簡單，因此，其管理也決不像電氣馬達，或是紡織機器一般便當。大抵政府是不能脫離人的，（其團體是人的結合，其活動是人的表現，）而人又是不能沒有意識的。人的意識不斷地影響着政府活動，則由此所生的效果收復便也無法加以控制了！譬如我們放下去相同的代價，經過一個長長的政府程序之後，我們取回來的却是不同的效果；所以行政效率並

不是被決定於一座機器，而是被決定於一羣有生命有意識的人的。

其次，若謂「物質效果」即構成了行政效率的全部，則不啻否認了政府的價值，反背了現代的事實。所謂「物質效果」，如果我們並未錯誤，其含義一定指由國家公務所產生底一些有形的利益，和可測計的價值；這種解釋顯明地已把所有無形的利益，和不可測計的價值悉擯棄在外。且依現代趨勢，政府所執行的公務大多數屬於後者，只有極少數才真正是屬於前者的；這個事實的存在，是爲了配合着國家的進步，也可以證實於各國預算的內容。據此，凡以爲可專顧物質效果而可不管非物質效果的，都是一種曲解，都是一種危言。政府要辦如修築道路，建造水壩一類的事情，我們固須儘量維護，但因為沒有有形的利益或沒有可測計的價值，而忽略了如維持國防，發展文化一類的要政，則其結果豈不成了「國將不國」的現象了嗎？

比較「物質效果說」來得簡單，但却一如「物質效果說」那樣不正確，是這裏要論及的「經濟說」底理論。主張「經濟說」的人對行政效率的看法，大致可以「效率等於經濟，經濟等於效率」一個公式去代表。這種理論的出發點，以爲資源在任何一个國家本不是無窮盡的，用政府力量去取得的必有其嚴格的限度，故爲執行公務而消耗尤應極力地節省。又有一點爲他們所公認的，即是這些行政所需的資源，無論其爲何種性質，却恰如商業上的成本；無論其取何種形態，都可以金錢去替它計值。歸根結蒂，他們所謂「經濟」並沒有什麼深奧的含義，實在也就等於說要減輕成本，節省費用，而在這個經濟觀念所築成的基礎上，便砌合着他們的所謂「行政效率」。

探究「經濟說」的成因自然有幾個，大抵一方面可說是戰時一般大眾傾向保存資源，減少消費的一種心理底反映，另一方面則有少數經濟學家，特別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想利用企業經營的原則，來約束國家公務的發展的一種企圖底表現。但不問這種理論是否發生於自私的或非自私的背景，我們對之只是不能「苟目所見」，因爲這種理論仍然不能擺脫其自身所有的兩個因素。一則，「經濟說」底論者把「行政效率」和「經濟」或「經濟化」

混成一談，便是沒有明白國家公務和私人企業根本不同的道理。我們必須承認私人企業之重視成本，乃由於營利賺錢一個基本動機所致；惟其以追求利潤，故不得不設法減少成本。但是國家公務的一個重要目的却是公益服務；如果有益公眾，即使任何代價也得去化。我們以爲成本決不是，也不應該看住國家公務唯一的決定因素；反之，在一切行政過程中，我們誠然要相當的考慮經費是否經濟，不過同時也要顧到手段是否正當，方法是否公平，以及結果是否損人害公。凡此種種大都爲一般企業家所忽視，然而自政府當局看來，却成了執行公務所「不可或缺」的種種考慮了！實際上，行政效率假使擺脫了這些考慮以後，也就必然地無從去了解，無法去探知其真義。

再則，「效率即是經濟」這個狹隘觀念如果移植到國家公務上面去，尙不免一種畏怯的副作用，這又爲「經濟說」底主張者所根本沒有見到。一個以「經濟化」爲口號的政府，往往可以變成一個事實上最浪費的政府。大抵所謂「經濟」或「經濟化」最重要的兩點，即如我們所說「減輕成本」和「節省費用」，爲要實踐這兩點，於是不惜出之減削行政人員的薪水，以及其他行政上必要的消耗。其結果弄得政府之中羣相離散，最後所剩的只是一些庸碌不堪的份子，即使尙有三數比較優秀的人員，也因缺乏正當經費，不能有所施展，以至於「百政皆廢，萬務不治」爲止，一切「自以爲」經濟化底思想，不必因而可得相應的效率底事實，但以一種「歪曲」的經濟論說來貫徹行政，未有不產生相反的浪費底結果！

由於上述兩個理論之都不健全，迫使我们尋求第三種說法。「甚麼是行政效率」這個問題底答案，要如足以令人滿意的話，我們以爲必然要附合下列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在觀念上政府行政可以，而且應該和企業經營截然分家。在相當範圍內，商學，或經濟學裏面的原理是不好引用於行政上面去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索性把行政和企業之間的界限打破。第二，行政效率必須配合着行政本身的目的。任何一種事務的效率，不過說明着其目的具體化到了怎麼程度，故凡以爲效率可與目的脫離關係的

都是支虛之談。

人類之組織國家，是基於滿足共同需要和實踐人類願望的一種企圖的；而政府即是為達到這種企圖而創設的機構，行政乃是為達到這種企圖所必要的手段。我們以為行政底最終極的目的，不但在供給僅僅若干公務，亦且更重地供給若干「至善至美」的公務，這個「至善至美」的行政目的，在其實現過程中的表現的程度即是行政效率；譬如我們說某種公務如何善美，便是指稱這種行政如何有效。但是怎樣才算「至善至美」了呢？如說即是「化錢最少」便與「經濟」一般無異，如說即是「產生有形的利益」便和「物質效果說」沒有區別。這些觀念並不足以包括「至善至美」四字的解釋，而我們所謂「至善至美」應採廣義的或社會的看法：政府之執行公務至少在理論上，是以全社會全人羣為其對象的，則行政之是否「至善至美」，必然要根據一切社會標準去加以評定。

行政的觀念是社會的，然則效率的觀念也應該是社會的。在一切之先，我們以為行政效率是一種滿意，特別是一種全社會人羣的感受的滿意。但這種社會滿意應該分成個人的滿意，和公務人員的滿意來說，人民是站在老闆兼作主顧地位的，自然一切公務必先要求他們的滿意；雖說公務的銷售是強迫性的，但他們儘可設法去避免投資，因而即使公務無法進行。同樣，公務是不能脫離公務人員的，所以這些人員也有權去要求從公務取得滿意；特別因為他們的態度、興趣等等，可以直接地支配着公務執行的成果，則除非他們自己感到滿意，行政效率便決不能產生。我們不必否認從人民或公務人員看出，滿意必然地歸根于他們所要求底行政效果和利益，但這些效果如利益可為物質的、精神的；也可為有形的、無形的。大抵社會滿意引起行政效率，同樣地行政效率也引起社會滿意，如此循環相依，沒有其一便不會

發生其他的一類。

但社會滿意必是有其代價的，這種代價便是求得行政效率所化的消耗和犧牲，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社會犧牲。所謂社會犧牲，正如社會滿意一樣，必須分別成爲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犧牲。上一種犧牲是直接地加到行政程序上去去促使行政效果之發生的，便等於一種不可缺乏的原動力。一切行政必然需要着人力的管理，需要着物力去補助，更需要着財力去維持，凡此種種人力的，物力的，財力的消耗，都是必要的，直接的犧牲。但下一種犧牲即是間接的犧牲却不大相同了！他不是發生的，而是引起的；他也不是有意的是却是意外的。譬如政府工人因發動一臺機器而誤傷了它底手臂，又如公司商舖因繳付所得稅結果耗去了一部份可作基金的錢款，這些傷害，損失，都論其為物質的，或是精神的，也無論其為有形的，或是無形的，我們都以為是間接的犧牲。如果行政效率與社會犧牲的關係是正的，即是社會滿意大而行政效率也大；則行政效率與社會犧牲的關係應說是相反的，即是社會犧牲大而行政效率却變小，反之亦然。

這種對於行政效率的看法本沒有什麼名目，我們姑且叫它做「社會價值說」。

總之，我們以為行政效率不是物質的（如「物質效果論者」所說），也不是經濟的（如「經濟論者」所說），而是社會的。換言之，即是效率的最終目的在求以可能最低的社會犧牲來取得可能最大的社會滿意。但我們必須注意這個關係：凡社會滿意之增加，率不是無窮限的，限度既達以後，則任何一切犧牲不能使其更增；同樣地社會犧牲之減少也必有它底限度，有時雖可超過，但非化一個極高的代價是不可的。我們可能求得一個合理的行政效率，但人間永遠不會有一個絕對的行政效率。

舊詩與新詩的節奏問題

(上)

孫毓棠

很有些人認為近年來新詩（白話詩）的產生是對舊詩詞一大革命，好像新詩是一個天外飛來的百分之百的新東西，與舊詩詞完全無關係。再加以新詩的內容材料完全是西洋式的，現代的，有如舶來品，與我們本國固有的舊詩詞完全不同。舊詩與新詩二者之間，對他們彷彿有一條寬廣的鴻溝，絕難

跨越。因此有些讀慣了舊詩詞的人說讀不懂新詩，或者說讀新詩絲毫得不到趣味，甚至於卑視新詩，以為他既無詩格又無詩意，簡直可笑。我的看法大不然。我以為新詩是承襲舊詩詞的更進一步的自然發展，二者原在一條綫上，新詩的基本原則與舊詩詞的絲毫沒有兩樣。若勉強尋找他們的分別，這

分別只在題材上，正如詞與古樂府的不同一樣。我們沒聽說過有人讀得背古樂府而讀不懂詞的。其實就在題材上，也沒有截然的區別，若更澈底一點說，他們之間本無分新舊。又有人說，舊詩可誦讀而新詩不可誦讀。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事實上新詩與舊詩一樣的可讀，讀新詩的方法及其基本原則本與讀舊詩完全相同，不過這一點大家未弄清楚罷了。我的意見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證明解說。本文先就舊詩詞與白話詩的節奏一方面作一個簡單的討論。

節奏是人類心理上自然的需要。我們坐在火車上，聽車輪前進的聲音，咕隆咕隆地響。本來車輪的前進是很機械的，一聲與一聲之間距離完全一樣，而聽而無止境，他本身並沒有頓挫。可是我們聽久了，便似乎自然而然的給他加上了人為的頓挫，而成為「咕隆——咕隆——」或是「咕隆隆——咕隆隆——」。錶表也是一樣，本來他的滴答滴答的聲音是單調機械無止境的，但在人聽覺裏便成了「滴答——滴答——」或「滴答答——滴答答——」或是「滴滴滴答——滴滴滴答——」了。給機械的調的聲音加以人為的頓挫，主要的原因怕是由於我們心臟的跳動與肺部的呼吸。因此說這種人為的頓挫是生理的，自然的，也未嘗不可。有了頓挫便成了節奏。慢的一聲兩聲一頓，快的一聲四聲五聲一頓。但也許因為呼吸的原因，六聲一頓便覺太長；至少六聲一頓的一頓中便又可分為三聲或兩聲所成的小頓，於是六聲一頓的頓便失了價值而又變為三聲或兩聲一頓了。單聲頓聲如此，其他聲音也莫不如此。譬如敲鼓聲易成「咚——咚——」或「咚——咚——」，走路便成「一二——一二——」或「一二三——一二三——」等。比較繁雜的弦索管樂，比走路繁雜的舞蹈，都產生自然的節奏，也可說是產生於自然的節奏。不管他音樂是多麼繁雜，舞蹈是如何的緩急不定，但他根本的節奏總是原始而簡單的。

詩是伴隨着音樂舞蹈而產生的，歌歌與手之舞足之蹈實是同時發展的。歌歌隨了樂與舞的節奏而生，節奏。歌歌之初恐怕只是呼嘯嗷嗷，迨由呼嘯嗷嗷進而增加了字與意，便成了詩歌。中國字是單音的（雖然古有複音，但自節奏上看，與單音作用全同，因每字都只有一個母音），便於適應簡單的節奏；字意為表達思想的，歌歌起來便自然產生頓挫（句讀）。在中國歷史中，這種伴隨着樂舞所產生的詩歌，最早的成績當推詩經。詩經中的詩歌以四言為主，從節奏上看，是最簡單最原始的，也是最自然，最合適於中國文字的。例如東山一章節奏成爲：

我徂——東山， 悠悠——不歸， 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

此詩每句四字，每二字成一組，每組一拍，每句兩拍，是很自然的。讀起來節奏是單調簡單而原始的，叫你聯想到原始人舞蹈時的緩慢的鐘鼓聲。每組的兩個字似當有一重音，如「我心」二字，讀時可重讀「我」字或重讀「心」字，因「心」讀所在而意義上也略有差別。但中國字是單音複詞的，有時不必拘泥于組中某字定當重讀，也有時任意重讀而其意義不變的，如「裳衣」二字。每組的字有時可讀得同樣輕重，然就其所佔時間與他組對比起來，仍不失其爲一組，如「東山」二字。這種音組適相當於西洋詩中的音步。以前也曾有人辯論過中國詩音組中何字當重讀何字當輕讀的問題，我以為這其受了英文中重音的影響，中國文字沒有這個東西，辯論毫無意義。但字無重音並不阻礙其組成音組的能力。這方面有些像法文。

這種簡單而原始的節奏蘊存於最古的詩歌中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此種節奏有幾個毛病。第一，中國古代的文法雖然伸縮性很大，但也有時意思受了節奏的限制，表達不出來。欲求把思想或情緒表達得清楚爽快，便不得不突破節奏的束縛來加減一兩字，或填補一二無什麼意義之虛字。第二，節奏太簡單，便容易使人感覺單調。對於節奏及節奏之美感覺銳敏的人，常喜歡在規律中求變化，整齊中求花樣。譬如教鼓的可以在單調的咚咚中加一跌，如「咚咚——咚咚——」或「咚咚——」，這種破格往往給單調的節奏增加了變化的美感。詩歌也是一樣。前者是想在文法辭義上求明暢，是不得已而爲之的消極的破格，後者是想在單調的節奏外求變化的美，是人爲的藝術技巧的積極的破格。二者相輔而行。詩三百篇難以四言爲主，每句兩音組在當時雖是最流行最習慣的節奏，但三百篇中這兩種破格的例到處都是，所以詩經中除四言而外，也有一二三言五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等種種的句子。這些破格的句子之產生，不管由於文法辭義或技巧的破律，其結果均能完成節奏變化的美。隨便舉幾個例：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卷耳）
魚麗——于——鱓， 鱓——鱓。 君子——有酒， 旨——且多。（魚麗）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之遠斯，莫敢一或違？（殷其雷）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中路？（式微）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與古處。（日月）
如日月隔之一日居月諸之一居一諸二字皆是無什麼意義之虛字，用以填補節奏，其本身則是呼嘯嗷嗷的遺跡。「乃如之人兮」的「兮」字原亦無意義，但加了他却給單調的節奏增加了變化之義。「胡不歸」三字原可在「歸」字上再加一字的，但破一格，把「歸」字一拍拉長，不僅給節奏增加了變化，而且強化了情感。這都是節奏的變化。以上諸例中又有一點我們可注意的。殷其雷的「在南山之陽」一句，文法上字字不可減，這五個字我們雖不知古人的讀法，但以今日的語調讀時（想古時當無大異），最自然的讀法是把「南山」與「陽」二名詞讀得重，而把「在」與「之」二虛字讀得輕，不但讀得輕，而且簡直可以隨口一帶就讀了過去。正如「我看他的信」五字中其餘四字皆可重讀，而其中的「的」字則非輕讀不可，且可隨口一帶就讀了過去。所以「在南山之陽」的「在」與「之」二字，及後例中的「的」字，我們都可以歸為一類，這類字因其可以「隨口一帶就讀了過去」的原故，我們可以在詩的節奏中名之為「卑音字」。這種字只在文法上有重要性，在節奏中除略增變化外，別無重要性。有他無他對於節奏本身無大影響。這種卑音字最普通是一詞一個，但也有兩個的，即可把兩個字很快地讀成爲一個字，其作卑音字的能力並無兩樣，例如「不用」二字，而「不用」二字在北平話中竟已化爲一聲。

四言詩還有個毛病，即句讀之處缺少一使人呼吸的機會。四言詩必需讀得慢（我們要注意古代的音樂的節奏是緩慢的），句讀之間才得從容頓挫而使人得以呼吸，如果一首長的四言如章孟的諷諫詩，急急地快讀，就感覺其節奏成了一片急鼓，喘不過氣來。這是因爲四言詩把句讀間呼吸的機會放在節奏以外去了，呼吸只好在句句之間別成一拍，到詩外去找。這種辦法又緩慢又不便。而且四言詩的每句兩拍，本覺太短，太短便即緩慢。

懲救此病，楚辭有創新方法。楚辭雖與詩經無關，我們至少可以說楚辭在節奏上產生一種新格，是詩經所缺少的。這種新格即以「一兮」字填補呼吸的空洞穴。這種辦法詩經中固然已有，但其效力不如在楚辭中顯明。例如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再如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這裏面也是每句二組，但每組有三字的有二字的「兮」字也是呼嘯嗷嗷之遺風，加進去不僅增加了悠揚蕩漾的韻味，且給「讀」處加了個呼吸的機會。不過這種調子仍然迂緩，因爲他沒有在句子完結處增一呼吸。也有如離騷的。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諶諶！諶余以！善淫。

這兩句中的「之」與「以」字是卑音字，所以每組似似二字，而「兮」字正是句與句中的一頓，這一頓時「兮」字正可幫助讀者一次肺部的吸氣。楚四言詩此弊之另一演化的結果，即是五言詩。五言詩與四言詩之不同處，即在五言詩把句與句間之呼吸加入了節奏之中，而成爲節奏的生命之一。如十九首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這裏每音組爲二字，但每句末組只餘一字，這一字與呼吸合爲一組。因爲這個發現，便使讀者緩急從容，呼吸化入詩的節奏而與詩打成一片，不再感棧角之虞。不過此處要提出另一問題，即音組與詞意之關係。前三句可巧按我們分組的方法，正使音組與詞意符合，但另舉一首詩，似乎就亂了，若使音組定與詞義吻合，則成如下之式：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潛飲酒）

如此則每句結尾有二字一組的，也有一字一組的，那麼與我們上面所說句尾因欲使其便於呼吸而減二字，豈非不合了麼？其實不然，詩中每句的節奏原是音樂性，合乎人類生理活動的，及於聽覺的產物，與詞意並無帶有密切的機械的聯絡。且每句的節奏是一氣呵成的覺不出痕跡的一個單位，如下兩句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甫北征）

我們說詩時並不把這十個字刻刻版地分成五個(或四個)詞意才讀得。從詞意上說固然要如此，但在音樂的節奏上仍可分作

皇帝——秋，閏八——月初——吉。

去讀，正如飲酒中那兩句讀爲「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樣。這層很像西洋詩中有時一個長字可分爲兩個甚至於三個音步，或短字改變了重音，或重音落在虛字上一樣，對於字意詞意並無多大的影響。

我們上面說過五言詩比四言詩的進步處是加入了呼吸又加多了(也是加快了)一拍。七言詩比五言詩不過更加多了一拍而已。七言詩是一句四拍。一口氣讀四拍，從中國語言的習慣上講，似乎是不多不少，剛剛分量正合適的樣子。試讀一首七絕：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即可覺得。當然，比七字四拍再多，也未嘗不可，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不過五音組的句子只能用於嚴格求節奏變化之時，若句句五音組，在習慣上便覺太冗長；不是不可能，但略感不方便。因此，中國詩演化至七言，便似乎走到極端，不能再進了。此中的原因恐怕大半由於節奏。

讓我們再討論節奏的另一個問題。我們上面也說過，對於節奏及節奏之美感覺銳敏的人，往往厭倦單調與呆板，總想在規律中求變化，將舊中求花樣，規律整齊固然美的因素，但太照循他，便單調呆板了，給單調呆板加一些變化，反更更美。這一點在中國韻文的歷史發展上，處處可以看出來。詩經時代，破四言而參用二三言五六言七九言的例子至多，已如上述，五言發達的時代，即有節奏的變化頗多的樂府存。樂府原用以入樂，音樂與詩歌結合的問題較複雜，此處暫不能討論，即便在五言極盛的唐詩之中，在四律中求變化，例也不知有多少。李白的樂府即是好例。在唐人中，李白怕是對節奏感覺最銳敏，試驗節奏變化(時而五言，時而七言，時又參入九言四言)最大膽也最成功的一個人，他的變化節奏而產生的音韻上的鏗鏘抑揚，抑揚曲折，實是後代詩家所難及的；不過普通的詩家，多半仍遵守已成的五七言各種格調，認爲是最自然最一美的形式了。(古體律詩排齊

美國之政爭與外交(紐約通訊)

X……我全黨代表大會所得的印象如下：(一)羅斯福之被推成以前定之事，而副總統候選人又須循羅氏之指定，故民主黨代表大會之一切幾成形式。除代表中顯然表示不滿與憤慨外，會場空氣殊不緊張。(二)反之，費城共和黨代表大會中我眼見威爾基凌駕杜威與塔夫脫而獲選，代表及觀

絕句等格調完全是另一問題，這問題太大，非本文所能討論。()

更進一步的變化節奏的試驗而成功的是詞。詞之成形，不管他最初如何與樂府同種地與音樂有關係，或後來變而對音樂獨立，但其基本的發展仍由於詞人有意地給詩歌加上節奏變化之美。此風一開(亦即是說這試驗一成功)，愈激愈厲，詞調也就日愈加多。最初的長短句與詞調都還難詩不遠，但詞愈發展，變化也就愈多，甚至於有些詞調在節奏上似乎已有過分雜亂之感。又有些節奏過分雜亂的詞調僅以韻脚來維持他的生命。節奏原是一個很纖弱的東西，太單調呆板了，便失了美，有如火車的輪聲；太雜亂無條理了，也失了美，有如鬧市的喧嘩。節奏的美就靠詩人在這兩極端之間，取捨剪裁，善意安排，加給他人以藝術的整理。這種工作正如一個音樂家之安排樂譜，藝術即在其中。

給節奏上變化多端的詞再加以自然語言的表現而成曲令，是又一層的發展，這一步發展自然而合理，且給語言增加了顏色與精神。試舉一例：

每日——日上——花梢，拋——綉——繡，捲——上——蛟——龍。字——臨——衛——女，詩——吟——蘇——蕙，史——續——班——昭。喜——清——課——賣——花，聲——香，催——好——句——心——字——香——燒。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一——任——那——舊——園——亭——鶯——啼——蝶——鬧。要——收——心——拘——禁——了——浪——遊——遊。

此中最可注意的是一「每日」一「紅了」一「綠了」一「一任那」一「拘禁了」等詞對於節奏的新適應。這些詞丟開了斯文氣，又假一些卑音字舒展了詞意，而與節奏適合得無痕跡。再舉個例：

……人生——何——苦——把——家——關——戀？……你——把——輕——舟——掛——了——帆，駿——馬——下——了——鞭，便——走——到——五——載——三——年，也——怕——你——遊——他——不——過。何——苦——將——這——破——屋——荒——田，與——旁——人——爭——長——短——論——短？你——說——道——傳——與——子——孫，只——怕——你——的——子——孫——敗——得——來——身——上——無——絲，手——裏——無——錢……(徐大椿戒爭產)

這真節奏的基礎與古詩並無兩樣，然而味道全變了，原因是在舊節奏上也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字的自然節奏的基礎上運用了新語言的結果。只要我們明白了節奏與語言二者的分別，即可了解新詩(白話詩)與舊詩詞的生命原是一條河道上的一條川流，他們的生命都寄存於同一的「中國文字之自然的節奏上」，決非截然兩個互不相通的世界。

下面讓我們再詳細分析新詩的節奏來與舊詩的節奏作一比較。(待續)

瑞 人

衆心理十分熱烈，一如觸電者然。(三)民主黨代表大會中孤立派聲勢仍大，幹部惟恐孤立派造反，又惟恐有主戰派之惡名，致在大選中失利，故黨綱上之對外政策已大較羅總統歷次之宣言爲退步。(四)在對外之政策上，願黨黨綱十分接近，可說無甚差別。此種變遷的標的恐將集中於「新政」與「

反新政一及第三任問題。(五)羅斯福於接受連任選總統候選人之廣播演說中，仍未改其反侵略，擁護民主和平，扶助被侵略國之立場。羅氏如獲常選，逆料外交仍將本素日之主張前進，不至為黨綱所拘束。共和黨之威爾基一向公然贊同羅氏之對外政策，且在共和黨各候選人中，為唯一有世界眼光而敢負責明主張者。故威氏如獲當選，美政府對外政策亦不會一反羅氏之所行。說者甚至謂威氏為人敢作敢為，不像羅氏在政治上多所顧慮，當政後對外或較羅氏更趨積極，亦在意料之中。(六)共和黨推威爾基為候選人，實可謂循民意(尤其是青年進步分子)之要求。全國開明輿論均推崇之。威氏之人才物望均可與羅斯福抗衡。故十一月選舉必有一番大惡鬥，尚未知鹿死誰手。一般人觀察兩方之勝利機會，為五十對五十。不過對羅氏同情者，於羅氏之估價稍高。其理由是：「新政」仍為全國農工階級中下層大眾所擁護，以此旗幟競選，或可克服反「三任」傳習之障礙，而使羅氏獲選。不過誰也不能斷定。

美國之政治局勢既如此，在十一月大選揭曉以前，在對外關係上恐不會有多大的積極舉動。但如日本發狂而有挑釁的行爲，則當然另當別論。至於十一月以後，美國對外是否有大的積極行動，亦尚要看歐戰之局勢如何。其實此三四個月內，歐戰之局勢如何發展亦將間接影響美國選舉之結果。蓋萬一在三四個月內英本國被德打倒，十一月後美政府儘管想積極，亦挽救莫及。而且大選之前英如崩潰，即是給羅總統以莫大之打擊，而更張孤立派之氣，因而羅之當選機會，亦自然減少。法之投降給了羅氏不少打擊，可為先例。反之，如果在此三四個月內英能支持，局勢可以好轉，則大選以後，無論羅氏或威氏當政，均可暢所欲言。參戰可，積極以物力援助被侵略國亦可。

中國抗戰局勢，當與上述世界全部局勢已不可分。安南緬甸之路斷，皆是歐戰變化之結果。其挽救亦繫於歐戰的好轉。所以當意無論如何中國仍應極力支持，徐觀變化，萬不可因日本一時之壓迫或欺誘，而中止抗戰，或變外交方針。同時，對於美方的援助，亦不可作過大的希望。有許多事美政府非不願為，但礙於孤立派之阻力，歐局之牽制，以及實力分配，技術上地理上之困難，確有不能即為之苦。不過美政府當局有兩點是很明顯的：(一)盼望中國堅決抗戰；(二)願以一切目下可能之方法支持中國抗戰。

目下美國所能做之事實不外(一)經濟援助，(二)外交表示，(三)禁運，(四)海軍駐太平洋示威諸端。海軍迄未調開完全是為牽制日本。美日緬甸協定之後，轉而即發出嚴重之反對聲明，並主張美不採並行政策。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二三〇號

汽油及廢鐵禁運問題久在研究中。前日居然由總統宣布，亦關係中國而來此一舉。至於借款，現時縱有法律上之困難，但希望似在增加。因此，在大選以前中國所能獲得之道德上及物質上的助力亦頗可觀也。……
紐約七月二十七日

本期撰者

名詩人孫毓棠先生是不肯輕易動筆。但他一動筆，總是一篇有價值的作品，抗戰以後他嘗寫過一篇關於抗戰的詩的論文，當時引起過不少的爭辯。本期登出的一篇，也是孫先生精心作品之一，讀者千萬不要輕輕放過。吳學義，吳之椿兩先生都是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他們當在各處有文章發表，想讀者必已熟識，不必詳為介紹。

周世述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本期所刊出的「紐約通訊」是從一位瑞士友人給本刊一位編輯的信節譯出來的。這位瑞士友人現正在美國旅行，他對中國情形頗為熟識，並且對中國的抗戰十分同情的。這篇通訊可以與本刊第四卷第四期錢端升先生的「競選期中美國內政外交」一併閱讀。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半年四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